

励精图治, 屡厄屡兴

——1893—1949 年间的武汉大学图书馆

邓珞华, 林 生

(武汉大学 图书馆,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邓珞华(1948-), 男, 湖南新宁人, 武汉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湖北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主要从事图书馆学研究; 林 生(1954-), 男, 山东文登人, 武汉大学图书馆馆员, 主要从事图书馆学研究。

[摘 要] 从 1893 年到 1928 年, 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的产生时期, 经历了晚清衰亡、民国混战、北伐战争后, 它从一个小型图书室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图书馆。从 1928 年到 1949 年, 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时期, 经历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洗礼, 它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功能齐全的现代图书馆。

[关键词] 武汉大学; 图书馆; 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9.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5)06-0872-08

武汉大学诞生于晚清时期, 后经历了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办学极其艰难。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 几代武汉大学图书馆人始终和学校同风雨, 共患难, 励精图治, 苦心经营, 藏书屡毁屡建, 管理屡厄屡兴, 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武汉大学图书馆已初具规模, 具备了现代图书馆所需要的基本功能和基本条件。

一、建校初期的武汉大学图书馆(1893—1928)

1893 年, 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经过 3 年努力, 创办了湖北第一所新式学堂——自强学堂。张之洞规定了其宗旨: “讲求时务, 融贯中西, 精研器数, 以期教育成材, 上备国家任使。”1902 年 10 月, 自强学堂改名为方言学堂^[1](第 5 页)。

从自强学堂到方言学堂, 有关其图书馆的历史记载寥寥无几, 但当时设有图书室则是毫无疑问的。据史料记载, 自强学堂和当时所有中国公学一样, 为吸引士人读书, “所有建造学堂工费, 华洋教习薪水, 委员工吏役薪工, 学生饭食、书本、洋纸笔墨以及学习各种学问器具图籍概由官备”^[1](第 10 页)。这里“书本”当指学生教材, 而“图籍”应指图书室的藏书。另据海外教育家苏云峰先生编制的光绪 33 年湖北教育经费支出表^[1](第 35 页), 当年湖北教育支出中有 63702 块银元是用于购买图书标本仪器。此外, 据校史资料记载, “1913 年教育部令贺孝齐就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设备及原有师资筹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2](第 2 页), 这说明图书、实验室作为学校办学的必备条件在当时就得到普遍认可。有图书就必须有“室”存放, 因此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有图书室应是不争的事实。

宣统 2 年 9 月, 湖北提学史高凌蔚和湖广总督瑞澂以湖北教育经费紧张为由提出停办方言学堂的

议案,宣统3年2月,方言学堂停办。

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国封建教育制度受到巨大的冲击。1913年,蔡元培先生任总长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对清末的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就有“兴办图书馆、博物馆、美术等社会教育”的内容。当年,教育部令贺孝齐就原方言学堂的校址(东厂口原农务学堂)、图书设备及原有师资筹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舍图书多仍其旧”^[3](第85页)。

由于历史资料的欠缺,武汉大学图书馆究竟是什么时间成立的,一直找不到准确的历史记载,但至少在武昌高师时期,学校图书馆就已经存在了,这是历史事实。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是1917年6月正式成立的。在此之前,学校相继成立了几个以学生为主体、有教师参加指导的学术团体,这些学会除了开展学术活动外,还组织师生捐赠书籍、资料,采集标本,建立图书室、标本室,编辑发行刊物,十分活跃。1917年6月,学校在各学会图书室的基础上,添置了一部分书籍,并从师生捐献、校际交流中得到一部分图书,正式成立了图书馆。11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另租赁校址东院民房为图书馆”^[3](第86页),此为“图书馆”一词正式出现在校史资料中,可视为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最早渊源。图书馆“为两层楼西式建筑,四周花木扶疏,颇宜读书研究”^[3](第86页)。武昌高师图书馆是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建立的现代图书馆之一,此时的图书馆已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它的主要目的是供读者借阅,按读者的需要进行采购和服务,一改古代藏书楼重藏轻用的做法。

经过两年的建设,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已经初具规模。1919年4月学校图书馆阅览、借书、参观人数统计表中^[2](第12页)的各项数字说明学校图书馆的工作已经走向正轨,初步具备了图书馆的基本功能。

武昌高等师范期间图书馆得到较快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当时的经费相对来说比较充裕。五四运动前曾经有人统计,武昌高师当时在校生251人,年经费110640元^[4](第28页),这个水平在当时全国几所高等师范学校中算是较高的,这使得武昌高师建校初期发展较快,图书馆建设也相应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1918年11月武昌高师举行了开办5周年纪念活动,同时向教育部报告了《本校现实状况及未来5年之计划》^[1](第70页)。这份记载了张渲校长当年雄心的报告已经遗失,但与这份报告一起上报的一份武昌高师校园平面图清楚地显示了当时校园规划已经十分得体,教室、图书馆、宿舍、自习室及其它生活设施都很完善,这说明图书馆在高校中的支柱地位在当时已经得到承认。

1923年9月,在当时全国修改学制的声浪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9月,又改名为武昌大学。1926年12月28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合并,建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区别于广州中山大学,亦称第二中山大学),后来归入的还有私立中华大学、北京中俄大学、上海大学的部分师生。

武昌中山大学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合并,当时汇集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和著名革命家,如邓演达、董必武、郭沫若、章伯钧、李汉俊、李达、李四光、沈雁冰、周建人、钱玄同、周作人、林雨堂、许德珩等。这本来是武汉大学发展的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发展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可惜不久以后的白色恐怖使国民党反动派视为共产党大本营的武昌中山大学仅仅生存了一年便夭亡了。1927年12月24日,武昌中山大学被解散,剩余师生被勒令离校,校产(包括图书)交湘鄂临时政府暂管。武昌中山大学图书馆当时藏书约一万余册,到1928年7月国立武汉大学成立接手武昌中山学校产时只剩下“图书仅百数十种,杂志仅十余种且残缺不全”^[3](第88页)。这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历史上第一次大的人为破坏。

二、规模初具的武汉大学图书馆(1928—1937)

1928年以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是武汉大学及其图书馆的一个高速发展时期。10年时间,武汉

大学从一所中小规模、设施简陋的普通高校发展成为一所具有文、法、理、工、农 5 个学院、15 个系、2 个研究所的多科性的综合性大学,在国内已享有一流大学的声誉;而图书馆则从一个馆舍仅两层小楼、藏书仅百数十种、管理不规范、业务水平低下的小型图书馆发展成为馆舍雄伟宽敞、藏书 10 多万册、订刊 600 多种、管理有章法、业务素质较高的大型现代图书馆。这期间图书馆所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就有:

(一)修建了一流的馆舍

1928 年,国民党政府决定彻底改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8 月 6 日,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发布大学院令,任命刘树杞为武汉大学代理校长,任命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雅各、麦焕章等人为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李四光为委员长,开始在武昌城外东湖之滨的落驾山(后经闻一多提议该名为珞珈山)勘察新校址^[4](第 104 页)。当年年底,新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报请中央及湖北省政府批准新校舍建筑及设备预算,其中图书馆建筑(含防火设施)费 17 万元,设备费(含防火设备及桌椅等)4 万元^[3](第 88 页)。1929 年 8 月新校选址工作基本完成,并由美国工程师开尔斯进行建筑设计。

1930 年至 1932 年春,武汉大学新校舍基本落成,但新图书馆仍未开工。1931 年 12 月,图书馆开始从武昌东厂口迁至珞珈山新校区的文学院办公。

直至 1933 年 9 月,总图书馆建筑设计方案才加以审定。图书馆使用面积达 6234 平方米,阅览座位 300 多个,这在当时国内大学中是首屈一指的。

1933 年 10 月,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通过总图书馆中心部分建筑设计方案,对外进行招标,招标结果由上海六合营造公司承包营造。

1934 年年初,总图书馆建筑开工。至年底,新图书馆外观已见雏形,次年,图书馆中心工程基本完工。1935 年 8 月,图书馆搬迁至新馆舍,新图书馆正式对师生开放。整个工程总计花费 344000 元,其中建筑材料施工费 229000 元,绘图费 15000 元,钢架及设备费 55000 元,电料设备费 10000 元,供暖设备及管道费 20000 元,器具及杂项设备费 15000 元^[3](第 88 页)。

武汉大学老图书馆的建成是武汉大学图书馆馆史以至于武汉大学校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首先,它以一流的馆舍和一流的设备雄居国内高校之首,象征着武汉大学经过 40 年的艰难曲折,成为国内的一流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经过 18 年的惨淡经营,成为国内一流的图书馆。

其次,武汉大学老图书馆以其建筑的精湛艺术和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武汉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和中国优秀历史建筑之一。整个武汉大学老建筑群坐落于东湖之滨,珞珈山下,依山傍水,占尽地理优势,而各个建筑体均绿瓦白墙,呈宫殿式结构与外型,既各具特色,又相互扶衬,更难得的是与四周山水融为一体,形成一幅绝妙的自然人文景观,使武汉大学校园至今享有“中国最美丽的校园,世界最美丽的校园之一”的美誉。如果说老武汉大学建筑群像一项华贵的皇冠的话,老图书馆就是这顶皇冠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位于老武汉大学建筑群的中心和制高点——狮子山顶,北俯东湖,南临珞珈,状如皇冠,居高临下,气势恢弘,与老法学院大楼、老文学院大楼、老理学院大楼、老斋舍一道,组成了校园传统建筑的主体。2000 年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58 处,“武汉大学早期建筑”15 处入选,而被其他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簇拥其中的老图书馆是其中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二)管理体制和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业务工作逐步规范

国立武汉大学成立以后,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开始按照现代图书馆的要求建立健全起来,其业务工作也按照现代图书馆采购、编目、流通、阅览的流程运转起来。

1928 年下半年,学校成立了“图书委员会”,决定每年划拨图书购置费 6 万元。11 月,校务委员会通过了《图书馆规程》、《图书馆借阅图书规定》、《图书委员会简章》等重要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说明武汉大学图书馆的管理从此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成为武汉大学图书馆管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国立武汉大学的第一部《图书委员会简章》规定了学校图书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馆长的职责、图书馆部门的设置及其业务范围。《图书委员会简章》规定:图书委员会设委员长 1 人,各院委员一般为 2 人,图书馆馆长为当然委员;图书委员会的任务是商讨决定有关图书的计划、经费的分配等事宜。《图

书馆规程》则明确规定,图书馆设馆长1人(当时由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胡庆生教授兼任),其职责是“商承校长总理馆内一切事宜”;馆内下设总务、编目、订购三个股,各设股长1名,事务员若干;总务股办理中西文牍、书库、杂志出纳、统计等,编目股办理图书分类目录编制事宜,订购股办理图书购买、登记号码及购书簿记。

1929年,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由预科主任梁明致代理图书馆馆长。在10月4日的第48次校务会议上通过了《订购图书办法》,该《办法》规定各院系及预科教员可将欲购图书开单交本院院长或预科主任审查、盖章签字,再交图书馆核定。

1932年5月13日,校务会议通过《寒暑假期中借阅图书规定》及《本大学各学院借阅期刊规则》,1933年9月,校务委员会修改了《图书馆规程》。修改后的《图书馆规程》在馆长之下设馆务主任,馆务主任的职责是“商承馆长指挥各股人员处理馆务”,由教务长皮宗石教授兼任图书馆馆长,著名图书馆学家、分类专家皮高品任馆务主任。10月20日校务委员会通过了增订的《图书馆借阅图书规则》。

1935年8月,图书馆从文学院搬入位于狮子山顶的新落成的图书馆大楼后,职工增至18人。为了适应新图书馆对全校师生开放的需要,图书馆在原有的总务、编目、订购三股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杂志股和出纳股。

1936年3月22日校务委员会通过《修订本大学图书馆规程》,6月22日又通过了《修订本大学图书馆借阅图书规则》。至此,武汉大学图书馆基本上已经确立了校长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确定了与现代图书馆特征相适应的部门设置,并制定和完善了图书馆的基本规章制度,图书馆的管理逐步走向正规化。

图书馆的业务工作规范主要是分类和编目工作的规范。1935年以前,武汉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是按照我国传统的《四库分类法》并仿照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一书的体例进行分类排架的。整个藏书分经、史、子、集、丛五部,每部之下分数类,类下分属,同类书按作者年代编排。1935年,经中文图书委员会决定,图书馆参照各家目录及《四库分类法》体例,另外制定了中文线装书分类法,对西文书、现到的中文平装书及日文书则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进行分类。1934年,武汉大学图书馆馆务主任皮高品先生所编撰的《中国十进分类法》及其索引出版,该分类法先后被武汉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采用,一直沿用到解放初期。

(三)藏书初具规模

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后的10年,由于直接隶属于国家教育部,经费有了比较可靠的保障,图书馆的藏书数量有了较快的增长,成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中山大学时期,图书馆的藏书才1万余册,而国立武汉大学成立仅仅1年,即1929年底,藏书就达到37715册,其中西文书由原来的两三千册增至19000余册。当年图书馆工作人员为13人,年经费6万元。1930年底,仅仅经过1年的时间,图书馆藏书数量又翻了几乎1倍,达到72000余册,其中中文书53000余册,西文书17000余册,日文书约2000册。此外,馆藏中外杂志达到294种,其中外界赠送64种,当年增订15种。当时藏书中,以文学类最多,其次为社会科学类,再次为自然科学类,其它如哲学、教育、历史、艺术类的图书也有少量。各学院藏书的分布情况是:文学院藏书达1万册,杂志百余种;理学院藏书约5000册,中西文杂志百数十种。

1932年底,武汉大学图书馆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藏书统计,馆藏图书共计94180册,杂志296种,另有国内各处赠阅公报87种。

从藏书的文种来看,武汉大学图书馆当时的藏书是以中文图书为主,但外文图书的增长也比较快,所占比重已达四分之一强,中外文文献的比例逐渐趋向合理,说明当时武汉大学已经比较重视吸收国外科学技术的成果。从藏书的学科分布来看,文、法、理、工(后来又增设农学院)都有相当数量的图书期刊,一个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的藏书体系已逐渐形成。从杂志的分布来看,当时的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均有一定数量的杂志,而以理学院和法学院的基础最强。

武汉大学农学院也于该年开始筹备,到 1935 年,该院图书馆室已陆续购置中外农学书籍 600 余册,中外农林杂志 40 余种。

1934 年 9 月底,武汉大学图书馆藏书突破 10 万册,达到 108922 册。年底,藏书达到 123758 册,其中中文书 89077 册,西文书 30493 册,日文书 4188 册;中文杂志 100 余种,1998 册,外文杂志 4287 册。

1935 年,图书馆藏书突破 13 万册,尤其杂志数量有了较大增长,达到 600 余种,其中中文杂志 100 余种,西文杂志 400 余种,日文杂志 40 余种。

抗日战争前夕的 1936 年,武汉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已达到 142000 余册,中外文期刊 665 种,比国立武汉大学建立初期增长了 10 多倍。

图书的馆际交换和捐赠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进行。武汉大学与德国汉堡大学和马尔堡菲力普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交换期刊并互赠书籍。1934 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就接受汉口银行公会捐赠的社会科学类的图书 600 余种,德国政府赠送的应用科学图书 100 余种 700 余册,日本出版协会赠送的日文书籍 290 余种 300 余册。此外国内的教授赠书也有相当数量。

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后的 10 年,是武汉大学从早期的弱小、单一、幼稚走向强壮、综合、成熟的阶段,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从小型自学性图书馆走向大型正规化图书馆的阶段。新馆的建立、管理的规范化、藏书量的快速增加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三个标志。

三、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图书馆(1937—1945)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继华北沦陷后,1937 年 11 月上海失守,12 月南京陷落,1938 年初,武汉被日寇三面包围,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大学于 1938 年 2 月 21 日召开第 322 次校务会议,后经教育部批准,决定迁校四川嘉定(今乐山)^[3](第 133 页)。迁校委员会决定先在宜昌、重庆两地设立迁校办事处,先将部分重要图书、精密仪器运往四川。1938 年 3 月至 7 月,西迁工作基本完成。从此,武汉大学图书馆在乐山度过了艰难的 8 年。

(一)图书馆在西迁中损失惨重

图书馆在西迁嘉定前对所有藏书进行了清点,计 149969 册,476 箱,其中 283 箱运达宜昌,另有中文线装书 104 箱、期刊 3 箱、日文书 13 箱、公报 27 箱、报纸 16 箱、书目 6 箱、共计 169 箱未及运走转移至汉口怡和洋行,其余 24 箱封存于图书馆地下室。

1938 年 11 月 11 日,日寇飞机轰炸宜昌,武汉大学西迁途中停泊于宜昌长江江面的船只被炸毁,140 余箱 7400 余册珍贵图书资料和精密仪器毁于战火,另有 97 箱图书落水受浸后霉烂变质。

1939 年 3 月 4 日,日寇飞机轰炸万县,炸毁武汉大学西迁途中存于此地的精密仪器 50 余箱。

1939 年 7 月,从武汉启运经宜昌轰炸后幸存的图书仪器终于运抵嘉定,但仅仅 1 个月,这批图书又遭到一次劫难。1939 年 8 月 19 日中午,日寇出动 36 架飞机,轰炸了嘉定(乐山),全城商业区一片火海。已迁嘉定的武汉大学公产损失 10 万元以上,7 人被炸死,20 余人受伤,图书馆损失藏书 7483 册^[2](第 85 页)。次后,为了避免图书再遭轰炸而损失,学校将大部分图书转移到乡下隐蔽起来。加之图书馆所藏中文课本及教学参考书大多存于汉口,师生借书无着,学校只好利用校油印所油印讲义发给学生使用。

1940 年 3 月 4 日,武汉大学迁校时存放在汉口特二区英商怡和洋行栈房的图书、仪器设备被日寇派来的海军士兵和苦力 60 多人以及载重汽车 20 余辆,将栈房前后门堵住,尽载而去,武汉大学存汉物质被洗劫一空。图书馆存于洋行的 169 箱 42128 册图书期刊、报纸、公报、书目悉数被劫。馆藏数量在该年 11 月份下降至 91751 册,损失近 6 万册^[2](第 86 页)。

由于战时经济困难,学校经费极其匮乏,图书馆所购图书极少,到 1940 年上半年已完全停止购买。此后几年经过艰苦努力,陆续添置,到 1947 年武昌复员后,图书数量才又恢复到 154455 册^[2](第 85 页)。

八年抗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我人民,强占我国土,掠夺我资源,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图书馆也在劫难逃。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二)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为师生服务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的8年中,历尽艰辛。图书馆的生存也同样万分艰难。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西迁的图书损毁严重;由于战时经费十分困难,头几年的购书经费几乎为零,馆舍也极其紧张;由于日军飞机不断轰炸,卫生条件差,读书环境万分恶劣。但图书馆在广大师生的支持和图书馆员的努力下,仍然坚持工作,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

学校迁往乐山后,总部设在城内文庙,图书馆总馆位于文庙内的大成殿,个别部门散在城内各处,如李公祠的理学院、高西门外的工学院等均设有阅览室。但毕竟战时条件艰苦,图书馆和阅览室不能完全满足同学们的需要,于是清晨的城墙上成了同学们朗读外语的好去处,周末的茶馆成了他们看书和自习的好场所。因为图书种类和数量都有限,同学们之间经常互通信息,及时到图书馆借自己所需的图书。有时一个人借来的书,其他人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抄写重要段落,以解燃眉之急。

1938年以武汉大学电机系学生为主体的学生社团“力讯社”成立,其主要活动是收听广播,编写战时新闻,出版壁报,自办小型图书室。电机系特拨出两间小屋,并出面将图书馆有复本并适于学生学习的书集体借出,加上部分社员提供的自有图书,办起了小型图书室,由社员轮流管理,通过简化借阅手续,缩短借期来加快图书流通速度,解决了战时图书借阅和购买困难,学生读书无着的困难。多年后,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校友还在《珞珈》等报刊上回忆起这一段艰苦而难忘的读书生活。

与此同时,学校一直保留了图书馆的建制,图书馆的员工也在想方设法为师生提供图书资料,努力使各项业务工作正常开展。1938年12月,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教授杨端六先生兼任图书馆馆长。1940年5月,学校修改图书馆规程,不再设馆长,只设主任1名,从外校聘图书馆学专家桂质柏先生任图书馆主任,同时兼外文系教授,直至1946年。1941年校务委员会通过决议,任命著名古典文学家,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刘永济先生为校图书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他再度出任该职)。当时全馆设总务、采访、编目、阅览、期刊和装订六股,共12名员工,他们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条件下想方设法购置图书,千方百计地为师生提供图书资料。学校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新建了一栋图书馆楼(在三育学校,称图书馆第二部),图书馆及职员住房四间,并修理了理工图书室、研究室一栋。1943年,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友好人士李约瑟博士应邀来乐山为武汉大学讲学,他对武汉大学图书馆艰苦而有效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八年抗战给武汉大学图书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也造就了武汉大学图书馆人爱国爱校、不怕艰难、勤奋工作的精神,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史上流下了沉重而光荣的一笔。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武汉大学图书馆

1945年8月18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学校按照教育部的命令,于1945年9月1日成立了“武汉大学复校委员会”。1946年6月到10月,武汉大学开始抗战后的复员工作,师生陆续从水陆两路返回武汉珞珈山,图书设备也陆续运回。10月3日,复校委员会在处理了一切善后事务(包括将部分图书资料赠送给私立乐嘉中学)后,离开乐山。10月31日,到达珞珈山的师生在学校礼堂举行了建校18周年庆祝大学暨复员后第一个开学典礼^[1](第183页)。

复员后的武汉大学在复员初期取得较大的发展。1946年5月学校恢复了农学院,10月又设立医学院,实现了国立武汉大学创立之初的建立“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的理想,与国际上的交流也有所扩大。1948年2月,英国牛津大学正式认可武汉大学毕业生在牛津之研究生地位,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协和医学院享有同等地位,这说明武汉大学当时已进入全国一流高校的行列。与此同时,图书馆也迅速恢复正常工作。

(一)清点藏书

复员珞珈山以后,图书馆在馆长曾昭安的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图书大清点。清点结果,武汉大学图书馆劫余图书 9 万册左右,比抗战前减少近 6 万册。

(二)购置新书

复员后,学校和图书馆想方设法购置了一批新书。1947 年 4 月,图书馆全部开放,此时图书馆藏书已恢复到战前水平,达到 154455 册,其中中文线装书约 10 万册(含善本书 5467 册),中日文平装书 10027 册,西文书 32827 册,中日文装订本杂志 1237 册,西文装订本杂志 4717 册。到 1947 年年底,馆藏量达到 1637000 册,其中中文线装书约 10 万册,中文平装书约 11000 册,西文书约 33000 册,中日文装订本杂志 1200 册,西文装订本杂志 4700 余册^[5](第 11 页)。

(三)接受捐书

1947 年,日本著名出版家,岩波书店董事长岩波茂雄先生为表示反战、和平思想,决定选择几所中国大学作为捐书对象,长期向它们赠送岩波书店出版物,当年,武汉大学图书馆首次接受了岩波书店的赠书。此后数十年,岩波书店一直持续对武汉大学的赠书,至 1983 年,累计达 1 万余册;1993 年底,累计达 2 万余册;2000 年底,累计达 25000 册左右。此外,在抗战结束后的几年,根据国民党的“依美外交”,武汉大学图书馆接受了一批以“国际联盟”名义捐助的图书资料。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前夕,武汉大学当时有部分教师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临行前将他们的部分书籍转交图书馆或委托图书馆保存,如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苏雪林在去台前将她的部分书籍委托武汉大学总务处庶务组主任、著名国画家端木梦锡先生保存,端木先生又将这批书籍放图书馆保存。

(四)1947 年 6 月,各学院均设立图书阅览室分室

此后几年,由于内战加剧,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内战,紧缩教育经费开支;另一方面,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危机空前严重,物价飞涨,币制混乱,学校办学经费始终处于困顿之中,图书资料建设也受到很大影响,图书采购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以情况较好的理学院为例,1948 年该院数学系有西文杂志 43 种,物理系有西文书籍 1000 余册,杂志 40 余种,生物系有西文书 4000 余册,西文杂志 40 余种,化学系有西文书 100 余册,西文杂志 10 余种,合计西文杂志 130 余种,而该院 1932 年的西文杂志数就已经达到 118 种,16 年仅增加一二十种。到 1949 年解放前夕,藏书量和 1947 年相比几乎没有增加。

与藏书建设停滞不前的同时,图书馆的管理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复员 3 年,图书馆尚无完整之清册与统一之目录;现编书目号码零乱不全,分类不清,编目方法亦未统一;偏重西文书,忽视半数以上中文书的整理和编目;中文线装书有半数尚未整理外借;购置图书偏重西文,不能兼顾师生之需;保管不善,虫咬水浸书籍严重。更为严重的是,图书经费一直由总务处支付,在全校经费中无一定比例;图书馆馆长一直为兼职,不能全身心投入图书馆工作;工作人员缺员严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学校的窘境。

1947 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全国爆发了反美抗暴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进步学生运动。1947 年 6 月 1 日,国民党军警枪杀了武汉大学 3 名进步学生,引发了震惊武汉和全国的“六一惨案”。为了纪念“六一”烈士,武汉大学进步师生于 1948 年 5 月自发地组织创办了“六一图书馆”。“六一图书馆”收藏师生自动捐助的各类进步图书,初由学生自治会管理,后由学生推选的历史学家、进步教授梁园东任馆长。直到 1951 年 11 月,“六一”图书馆的 8480 册图书才归并到图书馆^[3](第 91 页)。

1949 年初,在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会师南下,全国解放已成定局。为了迎接武汉的解放,让武汉大学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武汉大学的进步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组成了“安全互助团”,开展护校斗争。他们在狮子山顶的老图书馆设立了观察点,居高临下监视全校的动向。1949 年 5 月,武汉解放,6 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接管武汉大学。从此,武汉大学图书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参 考 文 献]

- [1] 吴贻谷,等. 武汉大学校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 [2] 武汉大学校史编辑研究室. 武汉大学校史简编[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 [3] 潘伯善. 武汉大学图书馆70年[J]. 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2).
- [4] 刘双平. 漫话武汉大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 [5] 董 鼎. 学府纪闻[M]. 台北:台北南京出版公司,1984.
- [6] 国立武汉大学. 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18年—27年[M]. 武汉:国立武汉大学,1938.
- [7] 国立武汉大学. 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概况[M]. 武汉:国立武汉大学,1936.
- [8] 马费成,等. 世代相传的智慧与服务精神——文华图专80周年纪念文集[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涂文迁)

Wuhan University Library from 1893 to 1949

DENG Luo-hua, LIN Sheng

(Wuhan University Librar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DENG Luo-hua (1948-), male, Research librarian, Wuhan University Library, majoring in library; LIN Sheng (1954-), male, Librarian, Wuhan University Library, majoring in library.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and discusses the difficult and tortuous course of the Library of Wuhan University from 1893 to 1949. From 1893 to 1928 is the immature period of The Library of Wuhan University. It was turned into a modern library from a reading room undergoing the declin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tangled warfa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From 1928 to 1949 is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the Library of Wuhan University. It was turned into a large, comprehensive and modern library with complete function from a small library undergoing two revolutionary civil and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Key words: Wuhan University; library; development